

# 中国哲学的

# 继承与创新

纪念石峻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

中



# 中国哲学的

# 继承与创新

纪念石峻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创新: 纪念石峻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ISBN 7-300-02720-2/B · 256

I. 中…

I. 中…

II. 哲学思想-研究-中国-文集

N. B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16669 号

## 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创新

——纪念石峻教授八十华诞论文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编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375 插页 1

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85 000

---

定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                         |           |
|-------------------------|-----------|
| 前言 .....                | 刘大椿 (1)   |
| 石峻先生学述 .....            | 杨庆中 (3)   |
| 易学中的道器之辨 .....          | 郑万耕 (49)  |
| 《公孙龙子》考辨与校勘 .....       | 庞万里 (60)  |
| 先秦儒家理欲观的积极价值            |           |
| ——兼谈汉儒、宋儒理欲观的合理因素 ..... | 温克勤 (71)  |
| 儒学的最初传授                 |           |
| ——孔子及门弟子略述 .....        | 崔大华 (80)  |
| 个体自由的精神超越               |           |
| ——庄子对理想人生的追寻 .....      | 周立升 (87)  |
| 中国哲学史上的力命之争 .....       | 葛荣晋 (100) |
| 论阴阳概念的形成 .....          | 刘文英 (114) |
| 中国佛教伦理及其哲学基础 .....      | 方立天 (127) |
| 试论中国佛教的宗教伦理思想 .....     | 傅云龙 (145) |
| 黄檗希运禅学思想三题 .....        | 杜寒风 (160) |
| “如来禅”与“祖师禅” .....       | 董 群 (181) |
| 成玄英《庄子疏》“变”论浅说 .....    | 向世陵 (194) |
| 从张载到王夫之                 |           |
| ——兼论宋明“气化论”发展的脉络 .....  | 冯正刚 (207) |
| 知行合一 是研究阳明心学的方法 .....   | 方尔加 (219) |
| 王阳明及其弟子在湖南的活动情况略考 ..... | 王兴国 (227) |

## 东林党人与晚明历史上的“人文精神”

|                                       |           |
|---------------------------------------|-----------|
| ——兼论以往对东林党人的研究 .....                  | 蔡大梁 (243) |
| 关于明清伦理思潮社会性质的探讨 .....                 | 唐凯麟 (252) |
| “去类界”与“去苦界” .....                     | 李书有 (260) |
| 严复和斯宾塞：不可思议与不可知的本体观 .....             | 陈庆坤 (263) |
| 五四时期胡适个人主义思想探析 .....                  | 张利民 (268) |
| 现代新儒家的现代化追求 .....                     | 宋志明 (280) |
| 现代新儒学研究在中国 .....                      | 方克立 (292) |
| 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化 .....                      | 张立文 (302) |
| 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 .....                       | 乔长路 (309) |
| 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 .....                    | 杨宪邦 (320) |
| 李退溪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发展及其对东方<br>文化的影响 .....    | 贾顺先 (333) |
| 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丰富与拓展<br>——谈少数民族哲学史的研究 ..... | 伍雄武 (346) |
| 后记 .....                              | (361)     |

## 前 言

● 刘大椿

石峻先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哲学界、特别是中国哲学史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享有很高的声誉和地位。在他八十华诞之际，学界许多同仁向他表示了热烈的祝贺与深深的敬意，大家都尊敬地称他为石公。

几十年来，石公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持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他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目前活跃在各大学和科研部门的中国哲学方面的骨干，相当一部分是他的高足。他对待研究工作厚积薄发，从不哗众取宠，数十年如一日，扎扎实实做学问。他主持编纂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佛教资料选编》等，在学界长期使用，颇得好评。他主编的《汉英对照中国哲学名著选读》，选材和译述精当，极有助于把中国哲学推向世界。

石公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了40年，是我系的元老、学术带头人。他为我系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所做的奠基性工作，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将为大家永远记取。我们也不会忘记石公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尚品格，以及他关心哲学系、爱系如家的敬业精神。

现在，主要是他的学生和同仁，荟萃自己的研究成果编辑了

这本《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创新》，以纪念石公八十华诞和他在人大哲学系从教 40 年。我们衷心祝贺石公的事业已结出了累累硕果，祝愿石公健康长寿、万事如意！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1981 年毕业的硕士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 石峻先生学述

● 杨庆中

石峻先生1916年10月25日生于湖南零陵（现永州市）一贫苦农民家庭，其父为人正直，同情革命。曾与朋友一同游历广东和香港，采办大量宣传革命的书籍带回家中，使石峻先生在幼时便有机会接触到新思想。

石峻先生上小学时，正值北伐前期，湖南农民运动高涨激烈，其父因接受过新思想，观念比较进步，被农民协会聘为小组长。不久，蒋介石背叛革命，湖南发生“马日事变”，一夜之间，许多革命者或亲革命者被杀头，学校也被迫停课。由革命到反革命，给幼年时期的石峻先生留下深刻印象。

石峻先生的中学时代是在长沙广义中学（今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度过的，广义中学为辛亥烈士禹之谟创办，有革命传统。但当时主政湖南的反动军阀何健，对中学控制很严，学生根本无自由可言。高中二年级时，学校学生会组织一次演讲比赛，石峻先生报名参加，演讲题目是《谈谈普罗文学》。当时的石先生并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只是同情革命，从报刊上了解到普罗文学（即无产阶级文学），思想上引起一些共鸣。比赛的结果，石先生获得第二名。

当时的中国刚刚创办高中（此前只有大学预科），课程应该如

何设置，尚处在一个探索阶段，教育部没有统一的规定和教学大纲。广义中学仿照大学预科课程设计教学计划，内容多而且深，如开有逻辑学、微积分、第二外国语及国学概论等课程。国学概理所用课本是钱穆编著的《国学概论》。石先生对这门课很感兴趣，因此，又自学了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这是石先生第一次接触中国哲学。

当时的高中文理分科，学习好的学生多上理科，石先生的强项是数学和物理，校长很赏识他，于是读了理科。三年级时，学校新聘一位刚从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数学教员杨炎和，石先生向他请教考学的事，表示要学中国哲学，问他应看什么书，他推荐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当时只出有上卷），石先生便买来阅读，更增加了学习中国哲学的兴趣。

青年时期的石先生很有抱负，立志要到北京去读哲学系。当时有哲学系的大学很少，学文科的人多选择历史或文学。而社会风气是重理轻文，认为好学生应该考理科。因此，1934年石先生以优异成绩被北大哲学系录取时，竟使中学校长感到非常遗憾。

当时北大课程安排不多，时间十分充足。由于离北京图书馆很近，可按自己兴趣借书来看，教员从不过问。各系课程可以任意选听，不必参加考试，还能免费得到讲义。30年代是旧中国学术水准较高的时期，由于大学很少，所有教员差不多都是当时全国最著名的学者。北大文科名人的课，石先生几乎都曾选听。他当时没有什么嗜好和应酬，自思没有什么家学渊源，主要得靠自学来积累，所以，求知的欲望一直很高。大学毕业后也仍然如此，继续不间断地选听著名学者讲课十年之久，直到晋升为副教授，等于做了14年学生，这在国内恐怕是没有第二人的。石先生始终觉得自己像一个青年学生，从不自满。

石先生看书范围很广，除哲学外，诸如历史、文学等等，都有涉及。他虽然不搞文学，但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的

每一本书他都读过，对普罗文学还有一定的研究，外国小说中看得最全的是托尔斯泰的作品。另外，对于理科的东西也依然有兴趣，由于中学时期的强项是数学和物理，在大学时期，对数理逻辑也很着迷。

1938年经汤用彤先生推荐，石先生留校任教，为汤先生做助手。在西南联大时期，石先生主要讲授哲学概论和伦理学，其间还曾代授中国哲学。时值抗战，生活十分艰苦，上课的地方距离住处有104米，须步行来回。那时没有电灯，点菜油灯备课，每月所得薪水刚够一人生活。

十年之后，即1948年，石先生受聘到武汉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兼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他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武汉大学日夜忙碌，终于迎来新中国。

解放初期，石先生任中南新哲学学会秘书长（潘梓年为会长，洪谦为副会长），并在中原大学主讲逻辑。当时由于受苏联的影响，一般的学校不敢开设此课，中原大学在当时几乎算是第一家。

1952年，石先生被调回母校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与冯友兰、张岱年两教授一起承担中国哲学的教学工作，在国内首开中国近代哲学史课程。他系统地听取艾思奇以及苏联专家讲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1955年，石先生为筹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而调入该校，1956年任哲学史教研室主任、校学术委员，1963年晋升为教授，兼校务委员。1981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我国首批中国哲学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石峻先生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顾问、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宗教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国家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成员等。

石峻先生作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大家、宗教史家、思想史家、教育家，在执教的60年间，先后开设了哲学概论、伦理学、老庄哲学、孔孟哲学、逻辑学、史科学、中国近现代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印度哲学、中国佛学、中国哲学史原著选读等十余门课程。在哲学尤其是中国哲学的诸多领域都有自己精深的见解和创获。下面仅就其中的某些方面作一简要的介绍。

## 一、哲学史方法论

石峻先生从30年代起开始研究哲学和哲学史，解放后又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在哲学史方法论方面很有心得。早在50年代便撰写了《论有关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和范围的讨论及其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的长文。80年代初期，又发表了《有关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几个问题》、《中国哲学史研究要进一步科学化》、《哲学史研究随想录》、《开展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意义》等文章，对于拨乱反正，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科学化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 （一）旧中国“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得与失

石先生认为，早在辛亥革命以前，我国一批受到西方资产阶级教育影响的前辈，已经开始了有关中国哲学的研究，特别是五四运动以后到解放前的30年间，不少学者参考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成果，冲破封建时代“道统”的狭隘观念，扩大了取材范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还存在许多缺点，大体说来，约有以下三种情形：

1. 把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编排外国哲学史的形式，依主观意图制成套子强加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以能迎和外国读者的口味，

使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不完备的西方哲学史。这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和本质特征，夸大了西方哲学的普遍性意义。这种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实际，抛弃中国民族文化一切特点的做法，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变成了宣传外国资产阶级哲学最理想的园地。如有人指出，胡适的《中国哲学大纲》“简直是介绍美国杜威一派实用主义的教科书”。

2. 不注意本民族的文化遗产，认为只有像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表述的那种形式，那种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才算是真正的哲学。他们“偶尔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感觉似懂非懂，面貌不同，从而肯定中国没有哲学，于是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采取一种蔑视的态度”。

3. 还有少数受过传统旧学训练的“国粹派”，他们一般不太了解西方哲学，因而对之采取抵制的态度。他们或者批评当时用西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新”学者不懂中国哲学，或者根据这批“新”学者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所引用的那点西方哲学的东西，指责西方哲学的浅薄，而主张中国哲学远远超过西方哲学。

石先生认为，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出现的形式主义地对待祖国哲学遗产的做法，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把中国哲学史研究引向科学的大道。

## **（二）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

石先生认为，要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客观历史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用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彻底摆脱一切盲从和迷信。不仅要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教条中解放出来，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言论，也敢于持科学分析的态度，力求做到一切以客观真理为依归。同时要占有经过批判审查的大量思想资料，理论联系实际，总结中国过去认识史的发展，特别是哲学思想战线上

两路线斗争的规律，但又绝不能将二者断然对立起来。

具体地说，第一，在研究问题时，不能只着眼于一般概念，不能孤立地研究概念的发展史，一定要联系具体情况解决实际问题。第二，要注意用发展的眼光研究中国哲学史，要认识到没有根本不变的思想意识，科学的哲学史研究一向是摧毁所谓“顶峰论”等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三，注意阶级分析，要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实事求是地评价某些哲学家和某种思想体系在当时的地位和作用。第四，正确认识哲学与生产斗争的关系，注意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的联盟，以及唯心主义世界观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阻碍作用。第五，正确认识哲学与阶级斗争的关系，注意理论体系方面“源”与“流”的关系。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是“源”，过去思想资料的引用是“流”，万不可主次不分，“源”“流”倒置，以致将哲学战线上的根本对立，简单地归结为纯学术问题，而取消哲学的产生、发展与阶级斗争的关系。第六，正确处理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具体学科的研究中去，比学习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需要更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因为具体问题总是比一般原理要丰富多彩。以前有个误解，让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人讲中国哲学，让水平高的人讲马克思主义，这是不对的。在具体科学中体现马列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不是照搬教条，这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

### （三）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其表现形态及内在本质是十分复杂的。石先生认为，强调哲学史上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斗争，并非一概否认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包含有价值的东西。唯心主义提出的问题，对于唯物主义得以自我完善和发展是有作用的。“相反相成的道理，依然可以适用于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

的斗争”。历史上有影响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是可以分析解剖的，是存在有可改造、可发掘的合理因素的。但是对于这种相互间的作用和影响绝对不可片面夸大，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不断得到发展，主要是由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所产生的新问题，需要根据事实做出合理的解答。而“不应该只是唯心主义的一些抽象的错误观点”推动的。同时要看到，由于科学的成就以及唯物主义思想的传播，使得不同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不得不采取新的面貌这样一个客观事实。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间也有批判继承关系，双方既有互相攻击对方弱点的一面，也有互相改造利用，真假颠倒，乃至于汲取提高化腐朽为神奇的一面。因此，对于唯心主义，一方面要彻底粉碎其体系，另一方面，又要挽救其中正确可用的东西。例如，唯心主义夸大了人类认识的主观能动性，这是十分错误的。我们反对这种错误，并不意味着要彻底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是要恰如其分地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必须认识到，并不是一切唯心主义哲学都是从天上掉下来或全是凭空而起，其内容也是有一定的客观基础的。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是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总之，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不完全像两军鏖战沙场，只有你死我活一种结果。

#### **（四）哲学史研究的范围、目的**

哲学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科学抽象和总结。但起初的哲学与各门具体科学几乎没有分别。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提高，各门具体科学如伦理学、美学、政治学以及物理学等才从哲学中独立出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研究哲学史，尤其是研究古代哲学史，是否也要包括对一些具体门类的研究？石先生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应绝对地看，而要有辩证的眼光。

石先生指出，哲学史这门学科的特点，有点类似于最近人们

常说的边缘科学，跟很多学科的研究如社会史、经济史、科学史、宗教史等等都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撇开了那些方面的研究成果，单凭哲学思想资料，有时很难作出全面评价，因为影响哲学家思想的因素往往是多方面的。因此，哲学史的研究既要特别注意科学的抽象，又要注意它与具体情况的联系。一方面要防止把任何具体的内容无原则地一概搬进哲学史，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把任何具体内容如伦理学、美学等等都从哲学史中清洗干净的做法。“总之，我们要求理论必须结合实际，得通过具体的情况来说明抽象的法则，反对把兴趣只放在脱离实际的空洞的‘理论’上。但是也不能将涉及的社会政治思想、伦理学和美学的具体事例、抽象观点和更带有普遍规律性的世界观，在哲学史中并列起来。”

石先生以中国哲学为例指出，中国历史上进步的哲学家有注重生活方式和工作态度的优良传统，他们更多地发挥了伦理（道德）和心理（精神）方面的思想，并特别注意“知”“行”结合的修养功夫，如所讲动静、理气、性命等哲学范畴的关系，实在并不限于专指外界事物的变化和构成（组合），往往包含了人们思想活动的某些更深刻特点，乃至道德情操等。如果把这些问题完全排斥在理论研究范围之外，在哲学史著作中几乎一字不提，显然是不妥当的。从哲学史的角度看，对于哲学家的思想不能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把他的自然观、认识论和社会历史观结合起来研究。

石先生认为，研究哲学史的目的，除了系统地总结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之外，还有一个进一步发展哲学理论的任务。具体地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需要着眼于现实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力求做到有的放矢，为现代化服务。

### （五）中国哲学史研究应注意的问题

1. 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石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哲

学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但是也不能把这种指导简单化和庸俗化，要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没有仔细地研究过东方各国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史的一系列问题，乃至一些历史上著名的哲学家，很少作过理论上的分析和科学的评价。就是毛主席论到过的历史人物和思想，虽然很具有启发性，可供参考，但除近代部分以外，也非常有限。因此要想根据这些革命导师的现成结论，来拼凑一部系统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已有现成结论的问题，因为时代不同，需要不同，也仍有继续深入研究的必要，切不可把背诵的只言片语当做今天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要认真学习的，只是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那只能是从当前的现实出发，以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

2. 反对教条主义。石先生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最需要避免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是不注意历史时期的一切特点，也不喜欢研究任何过去实际存在的具体问题。他们总是简单地从抽象概念出发，见到书上的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某人划归唯心主义阵营，就说他是代表没落贵族或地主阶级的思想；见到书本上几句话，字面上好像可以把某人划归唯物主义阵营，就说他是代表新兴地主阶级或中小地主的思想，或部分地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要求。对于哲学家们彼此间的争论，则往往归结为用一般概念来反驳一般概念，这就好比以这顶凭空扣上的帽子来抵抗那顶凭空扣上的帽子。结果是在做两顶帽子的空中对舞，从而使丰富多彩的哲学史变得枯燥没有内容。

3. 反对简单化和“应时主义”。石先生认为，研究哲学史，必须注意考察某一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的人在研究哲学家的思想时，停留在经验主义的描述上，“枯燥乏味和千篇一律地在介绍他们如何解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有无包含自发的辩证法因素和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等等”。还有的人习惯于一种形式主

义的思想方法，说好就一切都好，绝对地好；说坏就一切都坏，绝对地坏。“于是对于一个历史上主观认为进步的哲学家也就无往而不向好的方面拉，相反的情形，则又无往而不向坏的方面拉。甚至有这样的现象，对同一个人，在作这篇文章时为了表扬就采取第一种办法，在作另一篇文章时为了批评就采取第二种办法”。这种研究的态度是十分有害的。石先生认为，马列主义要学活，如列宁关于哲学史圆圈问题的论述，实际上是要说明社会思想发展的曲折性，即反复性和非直线性。有的人把圆圈画得那么圆，就不是马列主义了。

4. 必须特别注意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石先生认为，讲中国哲学，必须突出它的现实意义，“要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指导下，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的新情况来研究一系列的新问题”。石先生特别强调研究中国哲学史要把重点放在近代和现代，早在解放初期，他就曾在武汉大学讲授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进入80年代，石先生提出：最好有人注意研究我国古代哲学家的思想在近现代的反应，它们是如何被改造来加以应用的，这对于进一步阐明我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规律，肯定是会大有帮助的。

## 二、佛学研究

石峻先生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过程中发现，过去有些人，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对中国哲学史“通”不下来，主要原因是不懂佛学。因此，石先生认为，佛学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必须要弄懂的。

石先生从30年代末期以来，一直把佛学研究作为自己中国哲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影响的研究论文。